

农民工该怎样告别“二等公民”？

□ 石述思

千呼万唤之下，7月30日，一项被公安部副部长黄明称为“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是以往所没有的户籍制度改革”破茧而出。

新中国诞生以来推行了长达65年的城乡二元户口登记制度有望走进历史。其最大受益者是长期在城市居住就业的一亿农民工——他们将彻底转变身份，在城镇落户，并逐步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

同一天，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并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要逐步让他们融入城市“新市民”，享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同等的权利。不能把他们视为城市的“二等公民”。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巨大城乡收入差距，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成为漂泊的候鸟。“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发挥了十分巨大、同时也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李克强说，“有研究显示，中国近几十年快速发展靠的是人口红利，这个红利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工的贡献。”

随着政府最低工资制度的出台，以及《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曾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在工资谈判中的博弈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带动下，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大于外出农民工，这直接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增幅下降，很多东部地区的家庭陷入了结构性用工荒。

当欠薪风暴等经济问题退居二线后，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务工主角，他们独立意识、尊严意识、权利意识更强，加上由城乡二元制度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日益凸显——我国仅因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总量逼近

一个亿，如果不尽快消除城乡藩篱，可能会演化成可怕的社会问题，危及社会稳定大局。

也就是说，当下农民工核心问题从经济转移到了社会层面，而第一责任主体变成了政府。

在五年前产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3位农民工，也是农民工首次出现在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他们被媒体称为“每个人身后站着近一亿人”。到了十二届全国人大时，出现了31位农民工代表。虽然比例依旧很低，但已有重大跨越。

必须承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维护职工权益法规的完善，这些年农民工经济地位有了显著提升。2013年，外出农民工月收入为2609元，远远超出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46元，更是农民人均纯收入741元的约3.5倍。这些随着政府最低工资制度的出台，以及《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实施，曾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在工资谈判中的博弈能力有了显著提升，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带动下，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大于外出农民工，这直接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增幅下降，很多东部地区的家庭陷入了结构性用工荒。

当欠薪风暴等经济问题退居二线后，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务工主角，他们独立意识、尊严意识、权利意识更强，加上由城乡二元制度引发的人道主义问题日益凸显——我国仅因父母外出打工造成的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总量逼近

未来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会有更多的人从土地解放出来，涌入城市，在中国城镇化如此不平衡的今天，很多人会选择进入人口严重超载、资源能源、交通环境压力巨大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因此，如何推动整个人口流动管理有序是摆在决策者面前一道沉甸甸的考题。

和过去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外来人口不同，政策向更科学人性的方向迈进——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相对于各类摇号，这样的政策还是先进的——至少在努力达成城市需要和人口供给之间实现了更合理的平衡。当然，根本还在于政府在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投入巨资，引导流动人口流向中小城市。保守估计，想在2020年让两亿农民都享受到所有服务，政府至少还要额外支出20万亿元。

最终的落脚点是个钱字，现阶段超出财政的负荷。那就必须保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其关键前提是保证未来的城镇化是实体化、产业化、集聚化的——宛如农民工的户籍，在未来不是一个美丽的泡沫，而真正实至名归。

未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会有更多的人从土地解放出来，涌入城市，在中国城镇化如此不平衡的今天，很多人会选择进入人口严重超载、资源能源、交通环境压力巨大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因此，如何推动整个人口流动管理有序是摆在决策者面前一道沉甸甸的考题。

和过去简单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外来人口

不同，政策向更科学人性的方向迈进——改

进城

区人

口500

万以

上

的城

市现

行落

户政

策，建

立完

善积

分落

户制

度相

对相

关的

类摇

号，这

样的政

策还是

先进的

—少

在努

力达

成城

市需

要和人

口供

给之

间实

现理

的平

衡。然

然，根

本还

在政

府还

在保

护还

在推

进排

在排

在排